



“中华民族”自在生成与自觉构建语境下形（心）意拳的历史叙事逻辑

侯天媛，郭玉成

Self-Being Generat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Constructi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Logic of the Xingyiqua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Nation

引用本文:

侯天媛，郭玉成. “中华民族”自在生成与自觉构建语境下形（心）意拳的历史叙事逻辑[J]. 上海体育大学学报, 2025, 49(8): 66-76.

HOU Tianyuan, GUO Yucheng. Self-Being Generat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Constructi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Logic of the Xingyiqua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Nation[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2025, 49(8): 66-76.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6099/j.sus.2024.03.15.0002>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铠甲之“在身”：中国传统武术实战性的历史透视

When the Armor Being on the Body: A Study on the Actual Comba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6(9): 64-72

从叙事史到结构史：近代以来中国武术史研究的反思与转向

From Narrative History to Structural History: Reflections on and Turning of the Study on Chinese Wushu History Since Modern Times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6(9): 73-89

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的产生、发展及启示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National Chinese Normal College of Martial A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4(2): 87-94

认知、连接与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机制

Cognition, Connection and Solidarity: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Height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7(8): 1-11

中国运动训练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法论自觉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Theory
上海体育大学学报. 2025, 49(5): 15-24

在传统与自觉之间：湘西村落女性参与传统体育的行为逻辑——兼与万义博士商榷

Between Tradit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raditional Sports in Xiangxi Village: A Discussion with Dr. WAN Yi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4(3): 36-45



关注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资讯信息

原创成果

“中华民族”自在生成与自觉构建语境下形(心)意拳的历史叙事逻辑

侯天媛¹, 郭玉成^{2,3}

(1.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2. 上海体育大学 武术学院, 上海 200438; 3. 上海体育大学 中国体育历史研究院, 上海 200438)

摘要: 中华民族语境下的形(心)意拳曾保家国之危难、维社会之稳定、冠“国术”而传扬,是中国武术与中华民族观念形成过程同步且互构的一个缩影。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运用过程追溯、叙述性分析等方法发现,形(心)意拳的历史叙事体现出与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相似的叙事逻辑:在中华民族自在生成的历史时期,形(心)意拳的历史叙事中凝结于拳师个体生命的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天下观、民族观、家族观和人生观与中华民族叙事相融通;在中华民族自觉构建的历史时期,形(心)意拳的历史叙事从拳术理论到社会实践都体现出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反思与重构。中华民族语境下形(心)意拳历史叙事逻辑的重新梳理,对于探讨武术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历史作用和未来潜力具有时代意义。

关键词: 形(心)意拳;自在生成;自觉构建;武术;中华民族;历史叙事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98(2025)08-0066-11 **DOI:** 10.16099/j.sus.2024.03.15.0002

“中华民族”一词虽出现于晚清时期,中华民族观念却源自先秦时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费孝通^[1]将其总结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在中华民族从“自在生成”向“自觉建构”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武术与中华民族的观念形成过程同步且互构:中国武术以救亡图存的身体文化实践^[2],在各民族间频繁互动的历史中体现出强大凝聚力和教化力,在延续中国文化自强不息精神内核的同时,还吸纳了现代体育文化中的竞争精神^[3],显现出中国武术与中华民族命运叙事的深度融通^[4]。当下,武术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5],于外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6],于内则承担了重建民族文化的社会心理诉求^[7]。

在这种背景下,基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发掘武术的历史发展规律,不仅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必然

要求,也是中国武术研究的客观趋势。正如柯文^[8]所言,中国历史具有“内部取向”的发展规律:“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作为代表性武术拳种之一的形(心)意拳,在近400年的发展历程中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紧密关联,回溯中华民族语境下形(心)意拳的历史叙事,对于把握武术文化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历程中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当前的武术研究多侧重于具有特殊性的历史叙事而忽略了武术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机制。社会学家迪尔凯姆^[9]提出:“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过程的最初起源,应该到社会内部环境的构成中去寻找。”鉴于此,探寻“中华民族”语境下形(心)意拳的发展脉络,能够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交替中将时

收稿日期: 2024-03-15; 修回日期: 2024-10-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338); 上海市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TP2022101)

第一作者简介: 侯天媛(ORCID: 0000-0003-2132-287X),女,山西临汾人,苏州大学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社会与文化, E-mail: houtianyuan@139.com

通信作者简介: 郭玉成(ORCID: 0000-0002-4255-2706),男,山西新绛人,上海体育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与文化, E-mail: wushuxue@126.com

间叙事和结构叙事相结合^[10],进而考察形(心)意拳能延续下来背后的社会机制^[11]。具体而言,通过“关注国家权力和个体生命历程的互动”^[12],挖掘形(心)意拳在明清族群认同塑造和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所展现的价值旨趣和民族观念,追溯形(心)意拳自身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比较不同时期的发展样态,探索形(心)意拳如何将主流话语融入“地方知识”的建构,进而梳理其在中华民族语境下的历史叙事逻辑。

1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形(心)意拳历史脉络的互动逻辑

葛兆光^[13]提出,“真正绵延至今而且影响今天生活的是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反复思索的问题及由此形成的观念”。中华民族观念作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实体的归属与认同意识,凝聚着中国人整体认同的政治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走向^[14],是一种经历意识形态反复重构而趋于稳定的思想体系^[15]。以中华民族观念为指引的形(心)意拳传承实践,在其历史脉络中呈现出与中华民族认同相似的振荡频率,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对中国武术实践的文化统摄和价值定位。

1.1 自在生成: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形(心)意拳历史缘起的互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16]指出,“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中华民族虽是近代以来迫于应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全球化而被民族主义和国家各民族所构建的共同体,其建构的观念基础则源自中国数千年来逐渐形成的“以文化观超胜民族观”^[17]而共享的民族观念和文化认同。梁漱溟^[18]曾言,文化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文化的不同实际在于生活中解决问题方法之不同,这一点也是自在生成的中华民族观念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所在。形(心)意拳的历史叙事虽然看似并未与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完全同步,但若拨开历史的表象,对形(心)意拳发展背后的深层动因进行分析,就能清晰看到形(心)意拳文化与中华民族观念深层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天下格局”和“华夷之辨”的辩证传统作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叙事线索^[19],是中华民族尚未形成民族实体的无意识生成状态,也是所谓“自在”状态下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是中华民族观念自在生成的重要逻辑。中华民族观念作为凝聚

中国各民族的族群认同意识,也随着中华民族自在生成历程在“天下格局”和“华夷之辨”的辩证交互中逐渐明晰。在此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爱国团结、自强不息、崇德尚义、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质逐渐形成,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

在形(心)意拳早期传承的拳谱中,鲜明的军事特征揭示了其军事武艺下沉的来源:以战场拟对战,如“兵行诡道,兵战杀气,无不取胜”(《倚山武论》);以兵法喻拳法,如“解其意,晓知兵法,强退者,即要紧追,善走者,必有邪术”(《姬氏枪法》);以军阵喻身心,如“心为元帅,两手两足为五营四稍”(《倚山武论》)。在贵和尚义的中华文化中,形(心)意拳表现出强烈的攻防意识反映出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期,形(心)意拳习练者将“国家、民族的双重统一看作完成自身生命价值的崇高目标取向”^[20],以及拯救民族危难的历史责任。

明末清初,形(心)意拳的形成发展实质上是在“华夷之辨”的认知下由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出的具有抵抗性和防御性的民族情感。清初,姬际可以“吾处乱世,出可以操兵,则执枪以自保可也,若当太平之日,倘若不测,何以御之”(《六合拳论序》)为由,化枪为拳创立形(心)意拳。拳谱《七疾八正》中记:“文武古今之圣传,且系国家之大典,上有益于社稷,下能趋吉避凶,此生不可缺也。”时人认为,通过习武保卫民族与国家是与个人利益、自由和权利内在和谐的追求。虽为习拳,其意却在“以备操兵执枪”,这种理念体现了形(心)意拳以保卫民族国家为己任的立拳初衷,也是形(心)意拳精神内核始终与中华民族观念紧密相连的历史实证。

随着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社会历史发展,形(心)意拳传承中的多元文化互动不仅体现出文化认同超越血缘认同成为推进民族同化的主旋律,还彰显了自在生成的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兼容性和统摄力。形(心)意拳在回汉民族之间反复交流融汇的历史正是中华各民族不断扩大交往、加深融合的历史实证。此外,在以“家国同构”为特征的宗法制结构下,形(心)意拳的民间传承也以儒家伦理为内核,形成了基于血缘和拟血缘关系的传承结构,将习武修身视为具有超越性的人生追求,并在与镖局共生的历史中具化为以忠诚侠义为基本内涵的职业伦理。由此观之,形(心)意拳能超越身体认知层面,通过传统文化中由身而家、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的思想进阶,与人生理想、族群责任和家国意识相关联,这正是源于中华民族在历史中产

生和发展的社会观念。

1.2 自觉构建: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形(心)意拳传播实践的互动逻辑

晚清以来,为应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全球化,中华民族实体在真正意义上自觉构建成为民族与国家结合的产物,这是经我国数代革命者艰难实践和充分论证出来的具有制度优势和解释力的“民族国家”^[21]。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观念一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同化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追求民族独立、自由平等的新内涵。在中华民族观念的影响下,形(心)意拳的近代叙事通过强壮国民、革新国粹、改良国术和陶铸国魂的传播实践,起到了唤醒民族意识、宣扬民族精神和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自觉构建的过程是中华民族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在鸦片战争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洋学问不仅仍然被限制在天文、地理、数学以及器物制造的层面上,还常常被恪守传统的中国知识人贬斥”^[22],至19世纪晚期,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压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天下格局”解体、“华夷之辨”秩序崩塌,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陷入困境。自梁启超^[23]喊出以“中华民族”建国,“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始,历经了以“五族共和”论重塑“夷夏合流”民族秩序的尝试,引发了“中华民族是一个”^[24]的学术大论辩,直至各民族真正融合成为具有内部凝聚力的多元一体化民族自觉实体,中华民族观念随着自我认同的清晰而愈发激励人心。在民族存亡之际,形(心)意拳家以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提出“国术救国”的策略,“况当竞争时代,弱肉强食,若无武备以佐之,几难立于环球之上……当以何者为急务?亦惟岳武穆王所遗形意拳术,诚良法也”^[25]¹⁸⁵,并纷纷打破保守的传承规矩,以救亡图存、强国强种为己任,创办各种武术组织、社团,举行武术比赛、表演,著书立说,传扬国粹,传播形(心)意拳。

近代以来,包括形(心)意拳在内的武术拳种在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借鉴和融合,并形成风格各有特点、技法自成体系的武术流派,是中华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民族文化形成历程的缩影。在形(心)意拳的近代传承中,拳师们秉持保家卫国、报效国家的传拳宗旨,以“惟赖我五族同胞振刷尚武之精神,努力齐心,共捍卫我疆土”^[25]¹⁸³为由倡议全民习武,见证了中华民族以文化而非血统辨华夷

的历史传统,胡汉杂糅、各教混融的历史事实,以及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渊源渐渐明晰的过程。抗战时期,常习形意五行刀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在喜峰口战役中与日军近身肉搏^[26],他们顽强抵抗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振奋全国,并获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使中国人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7]。

近代中华民族观念探索和变迁的过程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努力实现的。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中国社会革命的道路进行深刻思考,意识到中国的广大人民才是社会变革的真正基础,中华民族是一个国际视野下的“无产阶级民族”^[28],这一思想的转变加速推动了中华民族从“自在生成”向“自觉构建”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形(心)意拳传播实践中关于“强国强种”和“科学化”的历史叙事揭示了中华民族意象从身体到话语的自觉完善,关于“体育化”和“尚武精神”的历史叙事见证了中华民族观念从实践到精神的自觉建构。

2 中华民族自在生成中形(心)意拳的叙事逻辑

形(心)意拳的传承谱系较为清晰,公认由明末清初时期的姬际可所创。历经近400年的发展,形(心)意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分别形成了以马学礼为代表的心意六合拳、以戴隆邦为代表的戴氏心意拳和以李洛能为代表的形意拳等拳理相通的拳种流派,传承人遍布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安徽等20余个省份。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叙事结构的演变,在从心意六合拳到戴氏心意拳再到形意拳的历史传承中,凝结于拳师个体生命的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天下观、民族观、家族观和人生观与中华民族叙事相融通,其实质上是以传统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体系为核心而建构的由社会至个人、由现实至超越的叙事逻辑。

2.1 天下观:“精忠报国”语境下的形(心)意拳民间叙事

在形(心)意拳的创拳历史叙事中,姬际可苦于不能直接从事反清斗争,便创立拳法,并借岳飞之名表达复国之志^[29]⁷⁻⁸,体现出明末清初以“华夷之辨”为焦点的天下观在民间群体中的实践路径。尽管这些创拳故

事经过数代重构和转述,已经与史实相去甚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民间叙事毫无意义,根据“知识考古”的理念,拥有共同叙事结构和核心内容的民间传说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记忆,是历史的传奇幻想化^[30]。这些在民族危难时刻应运而生的拳种携有鲜明的历史记忆,成为武术顽强生命的滋养力量。

天下观的形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周王室宗族成员在各地部落分封统治,建立起通过父系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度,形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统一格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成为维护“天下格局”的基本文化秩序。基于“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经明朝不断强化,在明清之际的政权更迭中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加之明朝自上而下对岳飞的“造神运动”,使岳飞在明朝以降的民间叙事中被打造为民族精神的化身^[31]。早期的形(心)意拳拳谱多以讲述岳飞、姬际可与此拳的关联作为开篇立论,《六合形意拳谱·六合拳序》阐述了从岳飞创拳到姬际可学拳的历史脉络:“(岳武穆)王以后金元明数代,鲜有其技。独我姬公,名际可,字隆风(或称“隆丰”),生于明末国初,为蒲东诸冯人氏,访名师于终南山,得武穆王拳谱。”《心意六合拳谱·姬隆丰先师遗训》篇解释了此拳绝迹多年的缘由是其在元朝时期遭到封杀,直至姬际可才将此拳复兴:“拳广传盛行于宋朝,为领兵元帅岳飞武穆所传……元朝后,有习此武艺者与岳飞同罪论处,因此相传绝迹,至明末清初后复兴。在清朝时期,有一总兵姬隆丰先生,乃山西平阳府蒲州均村人氏……云游四海,后至终南山遇异人授一拳谱。”

不仅如此,在形(心)意拳的历史传承过程中,民间叙事还将岳飞与形(心)意拳的关联反复刻画,意在突出形(心)意拳与岳飞精神薪火相传的家国情怀,使形(心)意拳成为承载民族精神和“忠义”记忆的场域:“岳武穆精忠报国,至正至刚,其浩然之气,诚沛然充塞于天地之间。故形意之精,非武穆不能道其详。”(《岳武穆九要论》)岳飞尤善枪法,因此枪也成为连结岳飞与形(心)意拳的关键信息,“岳王精通枪法,以枪为拳,立一法以教将佐,名曰意拳,神妙莫测,盖从古未有之技也”(《心意六合拳序》)。形(心)意拳“脱枪为拳”的来源在拳理拳法上皆清晰可见,枪法中“枪扎一条线”与形(心)意拳“守中用中”的拳理理出一贯,枪法中鼻尖、枪尖、脚尖“三尖相照”的技法要求与形(心)意拳

鼻尖、手尖、脚尖“三尖相照”一脉相承,也成为民间叙事中岳飞创拳的隐喻。

徐哲东^[32]在《国技论略》中曾言:“形意拳传自岳飞,其事殆出于依托,盖形意拳家借岳氏以增重也。”这一说法得到唐豪^[33]等人的认同,可见形(心)意拳创拳附会岳飞早已是共识。但时隔数个甲子,岳飞创拳的故事仍被数代传承人口耳相传,岳飞与姬际可之间宿命般的联系在民间叙事中超越时空稳定保留。可见,在不同时期的形(心)意拳历史叙事中,从岳飞到姬际可一以贯之的民族认同被反复叙述,恰好符合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34]提出的历史叙事经代代相传后表现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交响乐式”的叙事结构,足证人们对“精忠报国”语境下形(心)意拳民间叙事所创造的集体记忆的认同度已经超越了真实的历史。与此同时,岳飞创拳的民间叙事将民族精神凝结成形(心)意拳世代相续的精神内核和拳种基因,奠定了形(心)意拳传承近400年来以赤胆忠心保家卫国的历史基调。

2.2 民族观:“民族涵化”语境下的形(心)意拳民族传承

在“华夷之别”的天下模式之下,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表现出儒家的“大一统”天下观,以及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无限包容性,为“以夷变夏”提供了通路,形(心)意拳在回汉民族之间的传承历史正是中华各民族内部逐渐融合的真实历程。

中国回族以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信仰而特殊存在,历史学家姚大力^[35]称其为“久居汉地社会而逐渐土著化过程的历史产物”,心意六合拳的传承历史不仅体现了在回族的形成历史中汉族优秀文化的持续性渗透,也体现了“以儒诊经”“援儒入回”^[36]等回汉文化的阶段性融合。马学礼是姬际可之后的重要传承人,他将拳与回族信仰结合,取“心意诚为中,肢体形于外”之意,又为凸显内三合、外三合的特点,命名为“心意六合拳”,回族将习武强身视为圣行,故又称其为“圣行心意六合拳”^[37]。明代以来,在刘智等回儒提出“圣人之教,东西同,古今一”的背景下,心意六合拳习练时追求“心意者,意之心生,拳随意发,心气一发,四肢皆动”,杂念不生而后心能入静,静到极处,心与气合,超乎物外,物我不分,万物齐同,遂可入天人合一之境^[38],恰与以理学的哲理思辨重新诠释、充实的回族文化^[39]相趋合,从理论和身体实践方面促进了回族的民族涵

化进程。在心意六合拳的传承人中,河南南阳的张志诚,漯河的丁兆祥、买清选,周口的陈宪堂等都在当地回族人中颇具声望,他们以将心意六合拳拳理与回族文化融合的方式对回族民众进行教导。经历代传承,心意六合拳从少数人珍藏的武功秘法,逐渐发展为习武修行的每日功课,历代拳师都对其极为珍视,不仅择徒极严,练拳时也十分隐蔽,并规定“非吾教门弟子,切切不可乱传”^[40]。

心意六合拳以拳理和回族文化深层相融的方式根植于河南回族内部,以身体修炼实现了修行进阶,参与了回族文化涵化的历史实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内部相互交融的历史注脚,与姬际可创拳故事所传递的民族精神一脉相承。同时,回族的形成历史也为心意六合拳注入了更多文化意涵,体现了回族与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向化性融合过程。随着社会历史进程发生剧变,列强入侵将整个中华民族置于危难中,这一时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回族武术家,自觉扛起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大旗,与各民族同胞共同肩负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担^[41]。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民族共同抵抗侵略,将中华各民族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结,彰显出整个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思想观念。

2.3 家族观:“家国同构”语境下的形(心)意拳门派观念

中国人之“天下”观念,乃由“家”与“国”之观念融合会通而成,为家尽孝、为国尽忠、以天下为终极是中国人实现理想抱负的开展途径^[42]¹²⁴,形(心)意拳基于宗法制和拟宗法制的传承结构清晰展现了门派观念形成背后“家国同构”的精神力量。戴氏心意拳在家族内部的传承正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的宗法制度和家族观念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观念在家族中的历史传承实践。据《祁县志》^[43]记载,戴氏心意拳由戴隆邦将戴家祖传拳法和心意六合拳相结合创编而成。戴家在明朝数代为官,皆清操职守、为善一方。清军入主中原后,戴运昌弃官归隐麓台山,终身不仕新朝。其子戴廷栻于故里祁县建立丹枫阁,并镌刻楹联“扫清恶习辈辈铸武魂,启明新规代代锻文彩”,明嘱后世子孙习文练武,藏头暗含“扫清启明”之意,可见对戴氏家族而言,拳不仅是祖先留下的宝贵技艺,还是戴氏世代精神追求和民族气节的承载,后传至戴隆邦^[44]。戴隆邦结合多年走镖实战经验,将拳法整理成谱,著有《六合拳谱》,在祁县戴氏族内代代承传,后人称为戴氏心意拳,

当地百姓盛传“只知戴家拳打人,不见戴家人练拳”。相较于清晰的族内传承,戴隆邦心意六合拳的传承来源则存有争议,据戴隆邦所著《六合拳序》记载,“姬公名际可,字龙峰……传授于吾师曹继武”,这一说法虽经孙禄堂^[45]、李剑秋^[46]和宝鼎^[47]等数代名家转述,但仍有不少人对此事存疑以及关于戴隆邦学拳自河南李政的说法存世。

在武术的历史传承中,如同戴氏心意拳这样严守“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家训,仅在宗族内部传承的现象并非鲜见。家族是我国几千年来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实现“家国同构”的基本社会单元,族内成员由于共同的祖先崇拜而长期互助、共同自卫。拳谱《七疾八正》中有言,“设若妄传无义人,招灾惹祸损寿年”,可见家族对习武传拳的严格限制并非只是一味保守,更多是出于对家族内部利益的完整考虑。戴氏心意拳作为戴氏家族的精神力量和身体规约世代传承,严守“拳不打同胞,艺不出家门”的家训,印证了家族活动是“对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的追求”^[48]。宗法制度促成的门户之见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武术的广泛传播,但也为形(心)意拳技艺的不断精进和体系化凝练提供了绝佳场域。

李洛能作为形意拳的集大成者,其拳法改编自戴氏心意拳,这一点从一脉相承的拳理拳法上确证无疑,关于李洛能在祁县戴家学拳的民间叙事也可谓丰富多彩。据《太谷县志》^[49]¹⁸⁴¹记载,李洛能三年如一日为戴家义务送菜表达了对戴氏心意拳的向往,其真心感动戴母,遂打破家规,命子授拳;也有称李洛能本是少林拳高手,在常年与戴家人的交往中二人逐渐熟稔,并常常切磋拳技、相互传拳,因而形意拳以“取之社会,还之社会”的理念树立了“为国为民者传,尊师尊长者传,作仁作义者传”的“三传”规范^[50],以更为开放的方式传拳。尽管这些民间叙事的传拳因果有异,却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指向,即戴氏家规里广为人知的“自古心意无双传”。无论是戴隆邦还是李洛能,作为形(心)意拳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在他们的学拳生涯中,都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民族或家族认同边界,后人对他们学拳经历的演绎性叙事恰是人们对武术传承秩序中族群传承正当性的认同。形意拳的师徒传承模式正是以拟血缘的方式对族群传拳秩序进行延续和推广。

从宗法制下的戴氏心意拳传承到冲破宗族秩序桎梏的形意拳传承,正体现了清末国运维艰之际,在“家

国同构”的思想进路下,民间拳师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超越性精神为指引,以族群认同超越家族的边界而团结为民族的历史进程。

2.4 人生观:“忠诚侠义”语境下的形(心)意拳武术伦理

在中华民族自在状态下,自发而为的民族团结机制在个体层面体现为从血缘关系引申出的人伦,即理与情兼顾的伦理关系。形(心)意拳在明清时期与商镖文化共同繁荣的历史造就了其以忠诚为中心的职业伦理和基于侠义的人情关系。明末清初正值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潮,以货物贸易流通为主的商业经营模式促进了镖局业的兴盛,同时也带动了形(心)意拳的快速发展。

所谓“信义通商”,诚信是商业行为中的基本道德伦理,侠义则体现了中国人文精神中超越性的人生追求。传统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建立在世代代共同扎根的土地上,而对于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往往缺乏信任^[51]。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创造出超越地缘关系的信任机制是镖行能合理存在的重要前提。明清镖局业务主要有2类:①“走镖”,指运送货物、资金和人员等;②“坐镖”,指坐店、看家护院和保护库丁等。在银行票号出现之前,运输现银是镖局的主营业务^[52]。商品经济催生的流动性使镖局与商客之间的相处模式成为一种对传统中国社会人际信任建构机制的特殊考验。

镖行系统通过“江湖社会”的特殊信任机制以及武术严格的准入门槛和师承体系,将忠诚侠义纳入镖行伦理的基本要求。河南赊店(今社旗)在清代是“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中原四大商埠之一,戴隆邦在此地创立广盛镖局,替各路商人保驾护航。为广结善缘,戴隆邦在开封、洛阳、郑州以及雁门等地设擂,以先礼后兵、点到为止的方式表达了以和为贵、融情于理的武术文化精神,获得了客商和民众的尊重和信任,在社旗民间流传有“广盛镖局是闻名天下的君子镖,戴家拳是声震武林的仁义拳”^[53]之誉。咸同时期,晋商以票号“汇通天下”挈领中国金融革命,其“叶落归根”的文化传统使资本雄厚的巨商大贾群聚晋中,并愿为武艺精湛的镖师提供丰厚酬劳,吸引了诸如李洛能等大批武术高手汇聚于山西,时常相互交流、切磋武艺、研磨拳技,久而久之,形成了拳理丰富、实用性强的形意拳^[54]。在镖行中,“武为镖胆,义为镖魂”,除了过硬的

武术技能外,“言必出,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是镖行的职业守则,也是侠义精神的合理性实践。这段与商镖共生的历史将镖局的行业特质刻写在形(心)意拳文化中。

“忠诚侠义”语境下的行业伦理,一方面反映出传统中国情理交融的社会情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武师行为并非仅是商业规则下的价值交换,还是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正如韦伯^[55]提出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关系,与新教徒在工作中依靠使命式的热情重获内心自由的历程相似,寺田隆信^[56]认为,在晋商的商业观里,商亦有道,在以“勤俭”“不欺”为经商准则的前提下,追求商业利润同样可以实现人生价值。戴氏心意拳第4代传承人戴奎就曾为保商路,义务清除了在内蒙古草原祸乱多年的劫匪刘十二^[57]。在保镖过程中通过践行忠诚侠义的理念而获得自我价值感的提升,既是拳师安身立命的“治生”方式,也是对恪尽职守的褒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于一己而达天下”的精神追求。

武术行业伦理以忠诚侠义为基石,融情入理,体现出以德立拳、以武修身的人生价值,在追求“人人能与人相处得其道,而国自治,天下自平”^{[42][147]}的理想进路上,具有包容性和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由此自在生成。

3 中华民族自觉构建中形(心)意拳的叙事逻辑

近代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天下格局”崩解,民族意识觉醒,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安情绪中渗透着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妥协与自救。在从孙中山“三民主义”构想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58]的共同信仰的转变中,中华民族认同意识逐渐建构。形(心)意拳的近代叙事不仅从身体实践到拳术理论都体现出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反思与重构,更是凭借拳师们抵抗外国侵略者、对抗外国大力士等的出色表现,彰显出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这种与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内在契合使形(心)意拳在近现代的发展蔚为壮观,在强健民族体魄、振兴民族精神的时代诉求中走向巅峰。

3.1 强壮国民:“强国强种”语境下形(心)意拳的叙事逻辑

近代以来,鸦片战争拉开的序幕下是一片国贫民

弱的景象,自西周以来形成的“天下格局”理想秩序被打破,被迫“睁眼看世界”后是痛定思痛的自我反省。“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身体本体的问题是我国传统宇宙论的立论之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危难之际尝试以“病夫之讥,睡狮之消”刺痛积弱的国民,以期从身体而始团结起来建构新的中华民族认同。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彼时中国“国虚”“兵败”“民弱”,如身患重病之“病夫”。严复^[59]也认为,“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病夫”体现了改革家们以国家为基础而尝试建构的新的民族自我认同,成为中华民族意象的雏形。对此,毛泽东在《新青年》发文:“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60]改革家们认为,羸弱的身体是我国落后挨打的原罪,更是“病夫”之病灶所在。

当时,武术被冠以国性,称为“国术”,既为救治“东亚病夫”的良药,也是“强国强种”的不二之选,是民族认同在身体运动层面的体现。以李存义、孙禄堂为代表的众多形意拳名家感受到自身责任重大,摒弃门户之见,纷纷参与中华武士会和中央国术馆等武术社团的建设并出任重要职位,为弘扬中华武术、提升国民体质而不停奔波。李存义于1912年在天津成立了当时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民间武术社团——中华武士会,并亲自传授形意拳。中华武士会“旨在发展中国固有武术,振起尚武精神,为国民体育之辅助”^[61],聚集了张占魁、尚云祥等一众形意拳名家,在华北地区营造了浓厚的社会习武氛围。受此影响,北方地区武术社团如雨后春笋,逾百家武术社涌现,多数学校也开设国术课,形意拳家刘殿琛、李存义、李剑秋、耿继善和韩慕侠等都秉持“勿使前辈之遗珍失于我手,勿使国术之精神止于我身”的信念,亲自于各类学校中任教^[62]。

1928年,张之江应国民政府“冀以涤除东亚病夫之恶谥,振起民族固有之精神”的要求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并开始在各政府部门开展形意拳普及工作。次年,主持江苏国术馆教学工作的孙禄堂^[63]提出以形意拳为本“统一国术”和“普及国术”的方案,倡议江苏全省习练形意拳。他认为形意拳“言近而旨远,势简而义深,体万物而不遗,穷其理便可以资统一”,形意拳效法自然,动作简单而内涵深刻,了解了形意拳的拳理,其余“各种拳术,均可不外此理而求之”,且不受年龄、性别、职业限制皆可习练,易于普及。

从强壮民族身体的认知,到国技、国术的普及,与其说是“强国强种”的路径选择,毋宁说是在民族忧患意识刺激下中华民族自觉建构的一种表达方式^[64]。但这仍只是中华民族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小浪潮,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身体的积弱只是表象,想要救国必须另寻出路。在这段反复权衡的救国历史中,以普及形意拳为代表的身体改造运动也成为近代政治实践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普及和以实战技击为目的的武术训练在训练方法、内容、强度和要求上迥然不同。民国时期以“强国强种”为目的的官方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将武术强身健体的功能剥离出来,虽保留了武术对于技击的想象,却部分消解了武术的实战技能,这也为后续对武术“虚无主义”的诟病埋下了隐患。

3.2 革新国粹:“科学化”语境下形(心)意拳的叙事逻辑

尽管形(心)意拳的核心精神一直是以中华民族作为团结中心的想象,在形(心)意拳的近现代叙事中仍明显表现出“科学化”的强势影响,这是在中华民族的自觉构建过程中,以西为中用的拿来主义对自身文化进行迭代升级以实现自救的缩影。受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的启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想要救中国,以“科学”“民主”的理念突破中国传统思想桎梏尤为迫切。即便是对此持反对意见而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提倡者,面对种种现实问题时也逃脱不了“借西方之药治中国之疾”的愿望^[65]。这一时期,人们在认识论维度上表现出明显的“唯理性论”倾向,陈独秀^[66]认为,“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力图以科学理性覆盖所有文化领域。与之相应,包括武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视为缺乏科学验证的虚妄观念,需要以理性主义的方法对其加以改造。

武术作为一种深植于中国人文化生活的身体语言,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经历数百年生活实践凝结而成的形意拳本身早已形成了与中国传统医学经络理论、阴阳五行理论以及乡土通俗伦理深度融合的完整拳法体系。形意拳的桩功取“天”“地”“人”三才命名为“三才势”,又称“三体势”,体现了形意拳法“顶天、立地、做人”的价值取向。形意五行拳法在拳理上以五行相生之理强身,以五行相克

之理技击。形意十二形拳法取龙、虎、猴、马、鼯、鸡、燕、鹞、蛇、鹂、鹰、熊12种动物之特能,以“天地化生之形”合“十二地支”之数,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中“集天地之灵气,穷万物之变化”的想象路径。传统形意拳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物质世界属性和人体结构朴素的认知方式、联想思维和汲取手段,却也充分显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整统性而忽视精确性、注重主观感受而忽视因果逻辑的特点,且其立论的中医理论在近代中西医论争中备受争议,促使其在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和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科学新风中也开始破冰自省。

在形意拳的近代叙事中有大量以解剖学和人体力学的知识或生理学理论对形意拳进行阐释的尝试。刘殿琛^[67]在1912年出版的《形意拳术抉微》中就以生理学知识对形意拳的动作姿态和运动过程进行了精确描述:“全身之关节皆沿数运动轴以回转,而其筋肉之收缩程度不张不弛,务使各方面筋肉同时收缩无松缓者,方为圆满作到,故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无隙可乘,无瑕可摘也。”同时,辅以对具体肌肉和肢体角度的精确关注,如在描述“三体势”的上肢动作时,表述为“二头膊筋与三头膊筋平均收缩,俾前后相抵抗,肘向体中线扭转,上膊常呈九十至一百七十度之角”,相较于传统表述(“两肱屈伸,似直不直,似曲非曲”^[68]),更为明确精准、易懂易学。保定国术馆副馆长刘纬祥在《扶住丹田论》中引入近代医学中横膈膜的生理结构及其升降导致腹腔压力变化的原理^[69],对形意拳习练中气与力注入丹田的过程进行更为详细的机理性阐释。但近代科学对以“形—气—神”为核心的生命观的有限解释力使传统武术在机械唯物论的强势话语下饱受“神秘主义”的批判。

形意拳以西方科学推进自我理论体系的更迭是中华民族图强奋斗的自觉意识的显现,形意拳在近代传承中突破了因循守旧的心态,以更广阔的视野认识和分析自身的特质,以更加客观和包容的心态尝试将“他者”的“好的”理论为形意拳服务,使之成为形意拳自身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3.3 改良国术:“体育化”语境下形(心)意拳的叙事逻辑

在形意拳的近代叙事中,“体育化”语境下的形意拳价值调适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象构建中传统民间文化的存续,另一方面也意在强调中华民族建构的

新生基础。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儒家礼教的束缚被视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作为国家权力合法渗透和扩张的过程,精英群体对以武术为代表的民间文化进行价值重塑,宣扬民族国家命运下能够与西方体育平等对话的国家实力,既是中华民族与历史建立连续性的路径,又是“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目标的有效论证^[70]。在对标西方体育价值的过程中,形意拳经由以张之江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改造,衍生出表演、健身和竞技、对抗等一系列身体活动形式。为了对话西方体育中对力与美的展现,武术也着力突出对竞争力和表演的价值需求,形意拳传统中“尚意不尚力”的劲力要求和“练招不练套”的习练方式相应发生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口令—动作”、分段分解、循序渐进、标准统一的演练套路教学方式,形意拳一步一拳、节奏鲜明的特点使其以新式师生制的团体教学模式和兵式体操的操练方式在政府机关、学校中迅速普及。为了体现自由、平等的理念,一向主张“处柔守雌”的武术开始向竞赛化发展,形意拳也逐渐走向竞技场。在中央国术馆“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民族健康为宗旨”^[71]而举办的4次全国规模的国术国考以及武术擂台赛竞技展示中,形意门人以优异表现充分展示了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国术精神。以发扬国术的方式建立广泛的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图存和强国强种,成为时代赋予武术的价值与使命。

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涌入引发了以自由、平等、独立、解放等理念对社会秩序的重塑,形意拳传承因而也面临着情感与理性、人情与规则之间的重重矛盾,不得不在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与绝对服从的传统观念中寻求突破。以形意拳传授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武士会率先突破武术传统的门户之见,一改武术终身拜师学艺的传统模式,分速成班和专修班按需进行形意拳公开团体教学,在中学及高校中开展体育课教学,甚至组织创编、出版形意拳书籍。这种以公开、平等的方式发展武术的尝试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各级各类武术期刊以及报纸对形意拳等武术拳种的专题报道都在传达武术不再因袭守旧,而是以“科学”“民主”的新姿态进行发展的决心。傅作义、曹锟等亲自为这些著作提笔作序,揭示了民族危难时非正式制度下权力精英与民间武术发展之间的互动与引导。

看似是为宣扬国力而与西方体育进行对话的重构,实为民族自觉意识下以振衰起废为目的对武术进

行的功能性改造。“军国民思想”指导下的武术体育化过程虽未能完全融入西方现代体育中的健身、娱乐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武术对天人及群己关系的塑造功能,对于敦促武术返躬内省,破除封建迷信思想,进行科学化、规范化以及竞技化发展影响深远,使武术在以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情感为目的的传播、普及方面建立起更为牢固的生长基点。

3.4 陶铸国魂:“尚武精神”语境下形(心)意拳的叙事逻辑

毛泽东提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60]内忧外难之际,身体救国的策略只是救急之策,目光更为长远的革命先驱们希望通过强健身体,从而强健意志,进而培养出坚毅的民族精神,“尚武精神”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宣扬爱国主义和强化中华民族意识的时代语境。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精武体育会创办《精武本纪》会刊,将“尚武精神”归纳为“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形意拳在近代的快速推广事实上是国家危亡时期中华民族观念下形意拳围绕“尚武救国”的社会实践。

以报效国家为使命的“尚武精神”是形意拳近代叙事的题中之义。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后,李存义携形意拳弟子率领民众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保卫战中成功阻击沙俄军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的信心,弘扬了“尚武”的民族精神。1903年,郭云深与众师兄弟商议形意拳十二形拳法的具体名属及排序问题,确定了“龙虎为开,鹰熊合演”的序列,取“龙虎精神”以及“鹰熊竞志,取法为拳”的寓意,以突出展现形意拳刚毅威猛、勇往直前的精神。1914年,李存义在太谷与形意同门共同商定了“华邦维武尚,社会统强宁”的十字辈序^{[49]1844-1845},让代代形意拳传承人自入门之初就树立习武卫国的信念、牢记报效国家的使命,彰显了形意拳与国家责任的深度融通。

此外,在形意拳的近代叙事中,作为能够宣扬尚武、彰显国魂、增强民族自信、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记忆,形意拳家击败外国大力士的相关记述也屡屡见诸报刊、书籍等。李存义在北京擂台打败白俄洋人,清政府特赐金牌;孙禄堂曾赢得世界大力士格斗大赛总冠军;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万国赛武大会”上,韩慕侠挫败俄国大力士康泰尔;朱国福在上海法租界参加国际拳击比赛击败俄国拳击手裴依哈伯尔^{[29]120-137}。这

些历史叙事虽有部分内容有待考证,却揭示了近现代武术与国家话语的互动过程,以及武术缘何成为民众意识中国家符号的实践过程。

作为“尚武精神”的身体表达,形意拳不仅在技击风格上表现得刚猛直率,其门人还在民国时期历次全国性的徒手擂台赛中取得辉煌战绩。这些成绩既是对形意拳技击技能的肯定,也将其中蕴含的“尚武精神”广泛传播,迅速扩大了形意拳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当时很多主持各级国术馆教务工作的国术家是形意拳传承人,如曾任中央国术馆首任教务主任兼武当门门长、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兼教务长的孙禄堂,曾任中央国术馆武当门门长的高振东,曾任中央国术馆教务处处长的朱国福,以及各级各地国术馆负责人。他们为全国培养了大量习武人才,其中多数人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身前线,也把“尚武精神”带到全国各地。李存义结合多年形意拳实战经验编成的《南北拳术教范》和《刺杀拳谱》、尚云祥传授的形意五行刀等,也在抗日前线士兵教官奋勇杀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尚武”真正从精神落到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中。

孙中山^[72]在谈论“三民主义”时提出,“中国自秦汉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的一个国家”,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意识并非仅是对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想象,而是以长期历史实践为基础的凝结了民族智慧、民族情感、民族力量的意识形态。在形意拳的近代叙事中,形意拳家以对中华文化自身的反思和革新为起点,通过建立武术组织、社团承担起强壮国民的重任,以借鉴、融合近代科学理论表达出武术“科学化”发展的决心,以“体育化”改造尝试与西方体育平等对话,并以宣扬“尚武精神”凝聚民族情感、陶铸民族精神,这正是中华民族自觉构建过程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间行动的生动记录。

4 结束语

中华民族观念在从自在生成到自觉构建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影响中国人行为模式、思想方法和情感态度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构成了形(心)意拳传承中的基本道德认同和心理结构基础。在形(心)意拳近400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中华民族的认同边界一直在变,形(心)意拳的传承主体、传承方式甚至传承内容也随中华民族时代际遇的改变而被不断重构,但无论是家族还是民族,形(心)意拳基于族群认同的传承使命始终

未变,而其中弘扬民族精神和凝聚民族情感的历史叙事彰显了武术在中华民族建构历程中展现的强大动员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与其说形(心)意拳历史是中国武术历史的一个缩影,毋宁说是民族认同的时代产物,生而带有深刻的族群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73]在谈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观念和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支撑和外在表现,是中华儿女的精神象征和思想寄托,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中华民族语境下形(心)意拳的历史叙事充分显现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以武术文化为典型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力量,其既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交融传承的结果,又超越了各民族文化的具体形态,并将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作者贡献声明:

侯天媛:搜集资料,设计框架,撰写论文;

郭玉成:提出选题,调整框架,修改论文。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2版.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3
- [2] 董刚, 金玉柱, 陈保学, 等. 民国时期中国武术的身体政治逻辑及其现代意义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2, 56(1): 63-70
- [3] 杨建营, 王水利. 中华武术的文化精神研究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9, 53(3): 58-62
- [4] 刘红军, 花家涛. 国术: 一项基于近代中国语境的概念史考察 [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6(2): 45-52
- [5] 闫民. 武术的主体性思维及表达 [J]. 体育与科学, 2015, 36(2): 87-93
- [6] 郭玉成. 中国武术与国家形象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9
- [7] 王岗, 赵连文, 朱雄. “再发现”与“再出发”: 中国武术发展的文化反思 [J]. 体育学研究, 2019, 2(2): 6-14
- [8] 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M]. 林同其,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88
- [9] 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M]. 狄玉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127
- [10] 赵鼎新. 时间、时间性与智慧: 历史社会学的真谛 [J]. 社会学评论, 2019, 7(1): 3-17
- [11] 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 [M]. 4版. 陈强, 张永强,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170
- [12] 严飞. 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叙事和机制分析的反思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9(2): 131-137
- [13] 葛兆光. 思想史的写法: 中国思想史导论 [M]. 2版.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1
- [14] 黄兴涛. 重塑中华: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3
- [15] 金观涛, 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 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3
- [16]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9-09-28(2)
- [17]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35
- [18]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M]. 影印本.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61
- [19] 许纪霖. 家国天下: 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54
- [20] 李禹阶. 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J]. 历史研究, 2011(3): 4-25
- [21] 许纪霖.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 [J]. 文史哲, 2013(3): 128-135
- [22]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第二卷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404
- [23]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2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1066-1067
- [24]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N]. 益世报·边疆(周刊), 1939-02-13(4)
- [25] 张占魁. 张占魁形意武术教科书 [M]. 王银辉, 吴占良, 校注.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 [26] 李仲轩, 徐皓峰. 逝去的武林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38
- [27]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5: 27
- [28] 迈斯纳.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M].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 译.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165
- [29] 吴殿科. 形意拳术大全 [M]. 2版.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
- [30] 户华为. 虚构与真实: 民间传说、历史记忆与社会史“知

- 识考古”[J]. 江苏社会科学, 2004(6): 162-166
- [31] 李琳. 明代岳飞故事小说考论[J]. 江汉论坛, 2014(2): 109-113
- [32] 徐哲东. 国技论略[M]. 影印版.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12
- [33] 唐豪. 行健斋随笔 唐豪太极少林考[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54
- [34] 列维-斯特劳. 结构人类学: 巫术·宗教·艺术·神话[M]. 陆晓禾, 黄锡光,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46-69
- [35] 姚大力. “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J]. 中国学术, 2004, 5(1): 90-135
- [36] 孙振玉. 试论明清回回理学兴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4(1): 86-94
- [37] 马锦丹. 中原回族武术[J]. 回族文学, 2007, 156(4): 56-59
- [38] 马锦丹. 回族传承的民间武术心意六合拳考述[J]. 回族研究, 2012, 22(4): 101-106
- [39] 马雷石. 邓州心意六合拳[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19-20
- [40] 萧万源.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 1030
- [41] 戴洁茹, 杜树海. 回族查拳的历史叙事与近代践习研究[J]. 体育学刊, 2020, 27(6): 27-33
- [42] 钱穆. 民族与文化[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
- [43] 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祁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662
- [44] 卢润杰. 昭余春秋[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 392
- [45] 孙禄堂. 孙禄堂武学录[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1: 5
- [46] 李剑秋. 形意拳术[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2-3
- [47] 宝鼎. 形意拳谱[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62-63
- [48] 冯尔康. 中国宗族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364
- [49] 太谷县志编纂委员会. 太谷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50] 布秉全. 太谷形意拳史料研究[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8: 44
- [5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7-9
- [52] 李尧臣. 我的保镖生活[J]. 文史精华, 1993(2): 46-48
- [53] 郭瑾刚. 戴氏心意拳[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7
- [54] 史若民, 牛白琳. 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 101
- [55]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马奇炎, 陈婧,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69
- [56] 寺田隆信. 山西商人研究[M]. 张正明, 张道丰, 孙耀, 等译.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279
- [57] 陈振家. 原传戴氏心意六合拳[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287-288
- [58]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8
- [59] 严复. 原强[M]//王栻, 严复. 严复集: 第一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5-32
- [60] 二十八画生. 体育之研究[J]. 新青年, 1917, 3(2): 52-62
- [61] 佚名. 中华武士会公启[J]. 直隶教育界, 1913(3): 116-120
- [62] 郭春阳, 吕旭涛. 挑战与应战: 晚近形意拳传承变革的历史考察[J]. 体育文化导刊, 2017(11): 164-167
- [63] 孙禄堂. 江苏全省国术运动的趋势[J]. 江苏, 1929(12/13): 67-69
- [64] 罗志田. 西方的分裂: 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3): 20-35
- [65] 陈独秀. 谈政治[J]. 新青年, 1920, 8(1): 1
- [66] 陈独秀. 敬告青年[J]. 青年杂志, 1915, 1(1): 13-18
- [67] 刘殿琛. 形意拳术抉微[M]. 影印本.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13-14
- [68] 李洛能. 形意拳拳谱[M]. 太原: 太原市武术挖掘整理组翻印, 1984: 18-19
- [69] 何欣委. 古传形意拳秘谱汇宗[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8: 172
- [70]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 王宪明, 高继美, 李海燕,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93-94
- [71] 佚名. 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J]. 中央国术馆汇刊, 1928(1): 50-51
- [72] 孙中山. 三民主义[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3-75
- [73] 习近平.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 求是, 2024(8): 4-13

(下转至第98页)

symptoms were recruited and randomly assigned to either an exercise group or a control group in a 1:1 ratio. The exercise group underwent an 8-week table tennis intervention (3 sessions/week, 30 min/session: 5 min warm-up + 20 min table tennis + 5 min cool-down) at 65%–75% of maximum heart rate (HR_{max}),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no intervention. VWM performance, ERP components (N2, P3),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assess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A total of 52 participants (exercise group: 25; control group: 27)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A significant group $\times$ time interaction was observed for VWM accuracy ($F_{(1,50)}=4.269$, $P=0.044$, $partial\ \eta^2=0.079$), with the exercise group showing significant post-intervention improvement (mean difference=0.039, 95% CI=0.015–0.062, $P=0.002$). No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was found for reaction time ($F_{(1,50)}=2.291$, $P=0.136$, $partial\ \eta^2=0.044$). A significant group $\times$ time interaction emerged for N2 latency ($F_{(1,50)}=4.588$, $P=0.037$, $partial\ \eta^2=0.084$), whereas no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were detected for N2 amplitude, P3 latency, or P3 amplitude. **Conclusions** Eight weeks of moderate-intensity table tennis exercis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enhanced VWM accuracy in college students, accompanied by shortened N2 latency during task processing.

Keywords: table tennis; college student; depressive symptom; verbal working memory; event-related potential

Authors' addresses: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3.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1418, China; 4. School of Sports and Health, Linyi University, Linyi 276000, Shandong, China

(上接第 76 页)

Self-Being Generat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Constructi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Logic of the Xingyiqua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U Tianyuan¹, GUO Yucheng^{2,3}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nation, Xingyiquan has been widely spread by protecting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in times of crisis as well as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thereby acclaimed as a "national art". It serves as a microcosm of the synchronous and interactive form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wushu and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 study, using the methods of process tracing and narrative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Xingyiquan embodies a narrative logic similar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Chinese nation: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its self-being gene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Xingyiquan, condensed in the individual lives of its masters, progressively and interconnectedly aligned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narrative in terms of world views, national views, family views and life views. During the epoch of the self-consciousness construc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Xingyiquan mirrors the self-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elf-awareness, spanning from its philosophy to social engagement. The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Xingyiq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 highlights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n investigating wushu's historical role and future potential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Xingyiquan; self-being generation; self-consciousness construction; wushu; the Chinese nation; historical narration

Authors' addresses: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Jiangsu, China; 2. School of Wush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3. Academy of Chinese Sport Histor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